

s-d-g 模型中的四极算符与形变核能谱

吴华川
(苏州大学)

摘要

本文在 $U(15)$ 框架内讨论了偏离 $SU(3)$ 极限的形变偶偶核能谱结构的变化趋势, 表明能谱结构主要由 g 玻色子贡献大小决定, 而且在偏离 $SU(3)$ 极限时 g 玻色子的贡献减小。

一、引言

Arima 与 Iachello 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 ($U(6)$ 模型^[1]) 用 $s-d$ 玻色子很好地描写了偶偶核的低集体态。然而, 一些实验数据表明, 对大形变核, 更高的激发方式—— g 玻色子不容忽视。 g 玻色子的引进, 使模型由 $U(6)$ 扩展为 $U(15)$ ^[2-7]。用 $U(15)$ 模型的 $SU(3)$ 极限, 对大形变核能谱和跃迁的描述取得了一些成功。近来, J. Dukelsky、顾金南等人^[8,9]对一些非形变核能谱和跃迁的分析, 也为 g 玻色子的存在提供了佐证。于是, 系统地研究 $U(15)$ 模型的各种极限、研究各种极限之间的过渡以及 $U(15)$ 模型到 $U(6)$ 模型的过渡问题, 引起了人们的兴趣。凌寅生^[4]曾对 $U(15)$ 模型中几种可能的子群链的对称性进行过讨论, 但是, 除 $SU(3)$ 子群链外, 对其他子群链的认识还很不充分; 而不同极限之间的过渡状态, 尚无人涉及。

由于 $U(15)$ 模型远比 $U(6)$ 模型复杂, 要系统地进行过渡区的研究, 目前还存在很大困难。本文的目标是研究 $SU(3)$ 极限附近(即形变核的区域)能谱的变化规律, 特别是 g 玻色子对能谱的影响。Warner 和 Casten^[10] 在研究 $U(6)$ 模型 $SU(3)$ 极限向 $SO(6)$ 极限过渡时, 利用了改变四极算符内参数 χ 的办法, 成功地描写了过渡区中的能谱与 $E2$ 跃迁。在我们的前一篇文章^[11]中, 用类似方法对 $U(15)$ 模型中偏离 $SU(3)$ 极限的 $E2$ 跃迁问题进行了研究。结果表明, 该方法在 $U(15)$ 模型中也是有效的。该文中所用的 $E2$ 跃迁的算符一般形式为

$$T(E2) = (Q =)\alpha \left\{ (d^+ \tilde{s} + s^+ \tilde{d})^{(2)} + R_0 \frac{(d + \tilde{d})^{(2)}}{\sqrt{5}} \right. \\ \left. + R_2 [(g^+ \tilde{d} + d^+ \tilde{g})^{(2)} - 1.236(g^+ \tilde{g})^{(2)}] \right\}, \quad (1.1)$$

在 $SU(3)$ 极限下, $R_0 = -2.778$, $R_2 = 1.286$ 。偏离 $SU(3)$ 限时, R_2 减小, 这与 g 玻色

子的贡献减小相应。因而, R_2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偏离 $SU(3)$ 极限的一个度量。本文拟继续采用 (1.1) 式的算符 Q , 通过在 $SU(15) \supset SU(3) \supset SO(3)$ 基^[12]上进行的数值计算, 研究偏离 $SU(3)$ 限时的能谱及分析 g 玻色子的影响。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调参数去拟合某个具体的核, 而在于研究总的变化趋势。由于各能带带首的位置就决定了能谱的主要特点, 我们仅对各能带带首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及讨论。

二、 Q 算符与能谱

$SU(3)$ 极限下, $U(15)$ 模型之 Hamiltonian 为

$$H = -KQ \cdot Q - K'L \cdot L. \quad (2.1)$$

其中四极算符 Q 取 (1.1) 形式, 系数 R_0 、 R_2 分别为 -2.778 与 1.286。 L 算符为

$$L = \sqrt{10} (d^+ \tilde{d})^{(1)} + \sqrt{60} (g^+ \tilde{g})^{(1)}. \quad (2.2)$$

当偏离 $SU(3)$ 限时, 我们仍将系统的 Hamiltonian 取为 (2.1) 式的形式; 但由于偏离大形变区中心, 各种玻色子相对能量会发生变化, 因而算符 Q 内参数应作相应调整。原则上, 算符 L 内两项系数的比值也应相应改变。但当我们研究各带带首能量变化规律时, $Q \cdot Q$ 项的贡献才是主要的, 因而在偏离 $SU(3)$ 限时, (2.1) 中 $L \cdot L$ 项仍取为对角化的。

为讨论方便, 将 Q 算符改写为

$$\begin{aligned} Q = & \alpha \left\{ (d^+ \tilde{d} + s^+ \tilde{d})^{(2)} + A_0 r_0 \frac{(d^+ \tilde{d})^{(2)}}{\sqrt{5}} \right. \\ & \left. + A_2 r_2 [(g^+ \tilde{d} + d^+ \tilde{g})^{(2)} - 1.236(g^+ \tilde{g})^{(2)}] \right\} \end{aligned} \quad (1.1a)$$

其中 A_0 、 A_2 为常数, 值分别为 -2.778 和 1.286。在严格的 $SU(3)$ 限下, $r_0 = r_2 = 1$; 当偏离此极限时, r_0 、 r_2 由 1 向 0 变化。其中, 参数 r_2 标志着 g 玻色子贡献的大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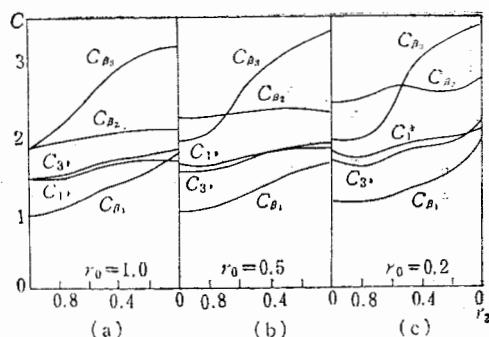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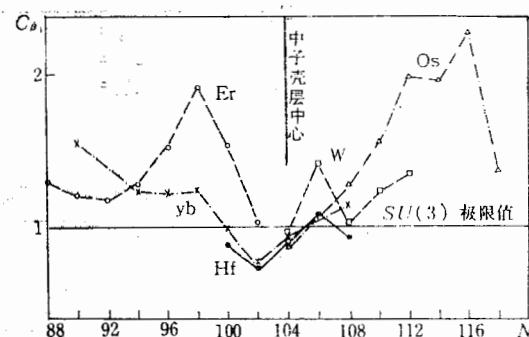
在 $SU(15) \supset SU(3) \supset SO(3)$ 基^[12]上, 对 (2.1) 的 Hamiltonian 进行对角化 ($L \cdot L$ 仍为对角项), 得到了各能带带首随参数 r_0 、 r_2 的变化规律。Sakai 的最新偶偶核能带表^[13], 给出了大量的 $K^\pi = 0^+$ 能带 (按带首能量依次称为 g 带, β_1 、 β_2 和 β_3 带, 其中 β_1 带即为通常的 β 带) 和 $K^\pi = 2^+$ 的能带 (γ_1 和 γ_2 带, 其中 γ_1 带即为通常的 γ 带), 为检验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。为了突出能谱结构的内在规律, 我们对 β_1 、 β_2 、 β_3 带带首与 γ_1 带带首能量比值进行理论与实验的对照。

图 1 给出了 β_1 、 β_2 、 β_3 带和 $K^\pi = 1^+$ 、 3^+ 能带带首与 γ_1 带带首能量的比值随参数 r_0 、 r_2 变化的规律; 这些比值, 分别记为 C_{β_1} 、 C_{β_2} 、 C_{β_3} 和 C_{1^+} 、 C_{3^+} 。计算比值时, 分子分母对应能级的角动量取得一样, 例如

$$C_{\beta_1} = \frac{E_2 + (K^\pi = O_2^+)}{E_2 + (K^\pi = 2_1^+)}; \quad C_{3^+} = \frac{E_4 + (K^\pi = 3^+)}{E_4 + (K^\pi = 2_1^+)}.$$

1. 计算结果的变化趋势

图 1 (a)、(b)、(c) 分别为 $r_0 = 1.0$ 、 0.5 、 0.2 时, 诸 C 值随 r_2 变化的情形。 $r_0 = r_2 = 1$ 为严格的 $SU(3)$ 限。此时, β_1 带与 γ_1 带简并 (即 $C_{\beta_1} = 1$), β_2 带与 β_3 带简并^[3] (即 $C_{\beta_2} = C_{\beta_3} = 1$)。图 1(a) 表示 C_{β_1} 随 r_2 变化的情况, 从图中可以看出, 在 $r_0 = 1.0$ 时, C_{β_1} 为常数 1; 在 $r_0 = 0.5$ 时, C_{β_1} 有微小变化; 在 $r_0 = 0.2$ 时, C_{β_1} 有明显变化, 且随 r_2 的减小而增大。

图1 各能带带首与 γ_1 带带首能量之比值图2 形变核 β_1 带与 γ_1 带带首能量比值 (C_{β_1}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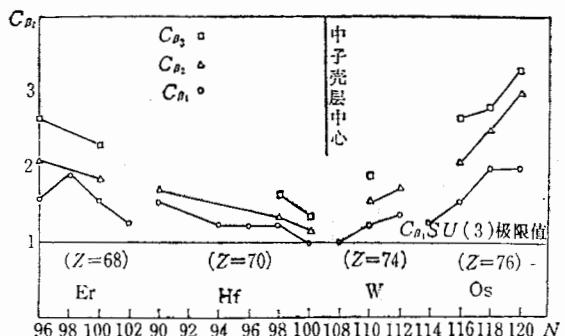
C_{β_1}), 3^+ 带与 1^+ 带简并^[3](即 $C_{1+} = C_{3+}$)。随着 r_0 及 r_2 的减小, 各项比值几乎都是单调上升, 上述简并均被消除。由图 1 很容易看出, 参数 r_2 对各项比值的影响是主要的, 而 r_2 又是一个代表 g 玻色子对 Hamiltonian 贡献大小有关的参量。这说明, 在 $U(15)$ 理论的框架中, 当偏离 $SU(3)$ 限时, 能谱的结构主要由 g 玻色子的贡献大小决定。随着 g 玻色子贡献的减小, 诸 β_i ($i = 1, 2, 3$) 能带带首相对于 γ 带的带首均呈上升趋势。

2. C_{β_1} 、 C_{β_2} 、 C_{β_3} 与实验的比较

图 2 列出了稀土区 Er、Yb、Hf、W、Os 同位素中所有偶偶核^[13]的 β_1 带带首能量与 γ_1 带带首能量比值随中子数 N 变化的情形。图中上部的粗线, 表示中子壳层中心(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最接近 $SU(3)$ 极限处)。各组同位素 C_{β_1} 的值随 N 而变, 且有较大起伏(从壳模型观点看, 这显然与支壳层的填充有关)。但从总体上看, 还是存在明显的规律性。在中子壳层中心 ($N = 104$) C_{β_1} 在 $0.893 \sim 0.969$ 范围内, 非常接近于 $SU(3)$ 极限的要求 ($C_{\beta_1} = 1$)。由中心向两侧展开时, 除少数核素的 C_{β_1} 有起伏外, 呈现基本对称的变化规律。当我们考察中子壳层中心附近的区域(形变核的区域), 这一规律就是: 离开中子壳层中心, C_{β_1} 呈基本单调上升规律。图 2 中 $^{164-170}\text{Er}$ 、 $^{160-170}\text{Yb}$ 、 $^{182-186}\text{W}$ 和 $^{184-190}\text{Os}$ 基本遵守这一规律。与图 1 相对照, 可以看出, 当偏离壳层中心(相当于偏离形变区的中心), 体系的 Hamiltonian 若取 (2.1) 的形式, 则算符 Q 中的参数 r_2 应当减小, 方能使理论关于 C_{β_1} 的预言与实验相符。这相当于要求: 在形变区中心 ($SU(3)$ 极限处), g 玻色子贡献最大; 偏离这一中心, g 玻色子贡献减小。这在物理上讲, 是完全合理的: 当偏离形变中心时, 组态空间维数变小, 且 d 、 g 玻色子能量差异加大, 因而由 $Q \cdot Q$ 力而引起的 $d-g$ 波色子转化更加困难, 故相应项对 Hamiltonian 的贡献亦应减小。

至于图 2 中 C_{β_1} 曲线中局部的起伏, 在 IBM 的框架下, 则可以通过选择微扰项的方法解释。

C_{β_1} 的理论预言与实验值变化趋势的这种符合, 也存在于 C_{β_2} 与 C_{β_3} 中。我们将 $^{164-170}\text{Er}$ 、 $^{160-170}\text{Yb}$ 、 $^{182-186}\text{W}$ 和 $^{184-190}\text{Os}$ 的 C_{β_1} 、 C_{β_2} 、 C_{β_3} 实验值列于图 3。与图 1 相对照, C_{β_2} 与 C_{β_3} 的变化趋势, 也要求算符中参数 r_2 减小(同时参数 r_0 也应减小)。这与关于 C_{β_1} 的结论是一致的。这种一致性支持了方法的合理性。即我们可以用 (2.1) 式的 Hamiltonian

图3 C_{β_1} 、 C_{β_2} 、 C_{β_3} 值随 N 之变化

来描写上述形变区内的核,但要求,当偏离形变区中心时,参数 r_2 应当减小,即 g 玻色子的贡献应当减小。所以,我们又可将 r_2 视为体系与 $SU(3)$ 极限偏离的一个度量。

3. C_{1^+} 、 C_{3^+}

由图1可见, C_{1^+} 、 C_{3^+} 虽然随 r_2 减小而上升,但上升幅度不大(在 1.5—2.2 之间),且 $K^* = 1^+$ 、 3^+ 能带带首总应处于 β_2 、 β_3 带首之下。在少数形变核中(如 ^{168}Er 、 ^{176}Hf)的确观测到合于上述要求的 $K^* = 1^+$ 或 3^+ 能带;但大多数形变核中,尚未观测到这种能带。作为 $U(15)$ 模型所特有的能带,对于模型的检验是十分关键的。在稀土区中的形变核集体谱中,规律性是相当明显的,许多参数也呈现出平滑的变化趋势,因而我们有理由期望,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,有可能在 ^{168}Er 、 ^{176}Hf 等的邻近核中找到符合上述要求的 $K^* = 1^+$ 、 3^+ 能带。若这种寻找失败的话,要么应当修改 $U(15)$ 模型,要么应当寻找其他形式的 Hamiltonian 来描写形变区的非 $SU(3)$ 极限核。

三、讨论

上节关于 C_{β_1} 、 C_{β_2} 、 C_{β_3} 的理论计算与实验的对照表明,在形变区,体系仍可用 $Q \cdot Q$ 相互作用来描写,只须改变算符 Q 内的参数 r_2 : 当偏离形变区的中心, r_2 减小。这表明,在 $SU(3)$ 极限处, g 玻色子贡献最大;当偏离这一极限时, g 玻色子的贡献减小。因此,在 $SU(3)$ 附近的形变区,核能谱的结构主要由代表 g 玻色子贡献大小的参数 r_2 确定。

必须指出,由于 $U(15)$ 模型中的计算远比 $U(6)$ 模型复杂,因而计算不能在全空间进行。当离 $SU(3)$ 限较远时,误差就较大。所以上述讨论,从总体上看是定性的,但在偏离 $SU(3)$ 限不远处,还是可以定量计算的。

作者对周孝谦先生的有益讨论表示感谢。本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A. Arima and F. Iachello, *Ann. Phys.*, 99(1976), 253; 111(1978), 201; 123(1979), 468.
- [2] R. D. Ratna Raju, *Phys. Rev.*, C23(1981), 518.

- [3] H. C. Wu, *Phys. Lett.*, **B110**(1982), 1.
- [4] 凌寅生,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**6**(1982), 77.
- [5] X. Q. Zhou and H. C. Wu, *Nucl. Phys.*, **A421**(1984), 159c.
- [6] H. C. Wu and X. Q. Zhou, *Nucl. Phys.*, **A417**(1984), 67.
- [7] A. Akiyama, Private Communication.
- [8] J. Dukelsky, et al., *Phys. Rev.*, **C28**(1983), 2183.
- [9] 顾金南, 凌寅生和高元义,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**6**(1982), 453.
- [10] D. D. Warner and R. F. Casten, *Phys. Rev.*, **C25**(1982), 2019; *Phys. Rev. Lett.*, **48**(1982), 1385.
- [11] 吴华川,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, **9**(1985), 229.
- [12] H. C. Wu and J. Q. Chen, Preprint.
- [13] M. Sakai, Tables of Members of Quasi-Bands, INS-REP-493, University of Tokyo, 1984.

THE QUADRUPOLE OPERATOR IN *s-d-g* MODEL AND THE SPECTRUM OF DEFORMED NUCLEI

WU HUA-CHUAN

(Suzhou University)

ABSTRACT

In this paper, the spectrum variation of the deformed even-even nuclei which deviate from the $SU(3)$ limit of the $U(15)$ model is discussed. It is shown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g -boson is crucial for some features of the spectrum structure.